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芬兰史

[英] 大卫·科尔比 著 纪胜利 等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芬兰史

[英] 大卫·科尔比 著 纪胜利等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图字：01 - 2012 - 4316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by David Kirby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芬兰史/(英)科尔比著;纪胜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0153 - 0

I. ①芬… II. ①科…②纪… III. ①芬兰—历史
IV. ①K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674 号

芬兰史

责任编辑：王卫东
责任印制：孙志莞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
地 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710
电 话：010 - 65258899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640×960 1/16
印 张：20.5
字 数：310 千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序 言

xii

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为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1918年,芬兰自俄国统治下取得独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的内战,在芬兰政治肌体上烙下的伤疤持续数十年。从1939年到1945年,芬兰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其间除蒙受巨大伤亡外,还失去了几乎十分之一领土。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芬兰政治史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深受冲突之困扰,与今日芬兰呈现之和谐一致的欧洲良好一员形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不再处于苏联阴影之下、自信而又坚定的欧盟成员国,芬兰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再造,还伴随着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芬兰不久前还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它作为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与所谓“真空带”的东欧国家不久前的检查制度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对一个民族过去的重新评价构成了本书的一个起点。虽然已考虑到社会、文化和经济均为构成因素,但不论就短期还是长期叙事而言,本书主要是一部政治史。

在采取传统编年史结构的同时,我尝试强调那些使芬兰得以成为今日之芬兰的特征。特别是,我着重强调空间、时间和政治这三个对话

xiv

言和文化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维度。生活在寒冷而又相当贫瘠的北方土地上的人们寻求适应和改变之途,即怎样使这块土地成为他们谋生之地和家邦的象征,铭记于芬兰人心中。从冰盖开始退去人类开始定居的遥远时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付出巨大努力安置数千难民,在这块土地上努力谋生的斗争乃是一部史诗和不变的主题。在此意义上,芬兰曾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国家,这可很好地用来解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两种敌对和冲突的力量都在芬兰人的生活中留下印记。第一种看起来出自竭力索求和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的强烈驱动。这产生了很强的服从权威的传统,这个传统又被路德宗、强有力的贵族机构和对法律的严格信奉所强化。不过,该传统同样更倾向于合作一致而不是强制。第二种是一种很少正式定义的出自野蛮、目无法纪的传统,一种漠视或不服从法律的边民心态。阿列克西斯·基维(Aleksis Kivi)写于 19 世纪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七兄弟逃避文明世界,过着自由的野外生活;带着大刀傲慢地游荡的波的尼亚的流浪儿们;两次大战之间违反禁令向那些四处游荡的瘾君子们提供致命酒精的非法贩运者;阿基·考里斯迈基(Aki Kaurismäki)的电影中甚至也充斥的散漫和可悲的特征:所有这些均属于带有对上流人士强烈不信任的野蛮、轻慢和松散的传统。这种传统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滑外表所掩盖,但它同样成为构成今日芬兰之一部分。

xv

现代芬兰历史似乎摇摆于长期相对稳定以及不易察觉的变化和导致一切改观的短期爆发之间。目前看来这其中一段又要来过。我尝试对照自己所直接经历过的最近背景以理解和弄清楚这些变化,这一经历构成了我自己关于芬兰的见解和观念,坦率地说我的许多结论都可能打上这一经历的烙印。过去多年里,我从与芬兰和英国同事们的讨论中获益匪浅,非此,则我不可能写成此书,我要对他们的善意和支持表示感谢。我还必须感谢为我挑选图片提供方便的芬兰国家古迹局和赫尔辛基劳工档案馆。同样还要感谢总统档案馆允许我复制吉科宁总统 1961 年访美受到肯尼迪总统欢迎的照片。

芬兰的官方语言有两种,大多数历史专有名词源自瑞典语。在我

认为恰当的地方,我使用瑞典词汇并同时标出芬兰语。除由于历史原因,瑞典语地名在某地更加著名外,譬如,1721 年的《尼斯泰德条约》(The Treaty of Nystad of 1721),省、县和城镇的名字仅用芬兰语冠名。在某些情况下,我同样追本溯源,以芬兰词汇命名重要的机构,如议会。

序言 / 1

第一章 中世纪的疆界 / 1

第二章 瑞典的遗产 / 25

第三章 从斯德哥尔摩到圣彼得堡,1780—1860 / 56

第四章 萌芽中的国家,1860—1907 / 86

第五章 独立的国家,1907—1937 / 122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1939—1956 / 165

第七章 吉科宁时代,1956—1981 / 205

第八章 从民族国家到欧盟国家 / 234

大事记 / 259

芬兰总统 / 269

选举与政府 / 270

注释 / 274

导读 / 278

索引 / 288

译者说明 / 315

第一章 中世纪的疆界

北欧构成今日芬兰共和国包括水陆在内共 338 145 平方公里的自然轮廓,成型于大冰期之后。退去的大冰川冲蚀了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大陆架的结晶红岩石,在它身后留下了数千个浅湖、蛇丘、鼓丘,以及犬牙交错的海岸线,由于陆地还在从巨大冰川的压力下恢复过来,这样的海岸线仍然不断地从海洋中浮现出来。只是在芬兰极北端,陆地才高出海平面 1 000 米以上。在东面,曼塞尔凯丘陵是分别向西注入波的尼亚湾和向东注入白海的河流的分水岭。芬兰中央和东部庞大的湖泊系统被进一步向东南方的南海岸延伸的众多分水岭同海岸线分割开来。内陆地区几乎四分之一的表面被水所覆盖,进而有百分之二十为湿地,多半是沼泽和泥淖。除了极小的一块突出的陆地位于北纬 60 度线以南(奥斯陆和设得兰群岛在这一纬度上,斯德哥尔摩稍微更南一点),芬兰可称得上是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中最北面的,它从波罗的海北岸绵亘一千多公里直到北冰洋。夏天温暖,但很短暂;冬季漫长、黑暗和寒冷,不过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别,西南部地区积雪的覆盖平均 70 天到 110 天,东部地区是 160—190 天,北部地区则是 200—220 天。北方土地上的居民们不得不学会在寒冬、洪水泛滥的春季生存,也包括反复无常的夏季,因为 5 月或 8 月的霜冻可能会破坏农作物。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文化:顽强的适应力、忍耐以及辛勤地劳作受人尊敬。

芬兰是一块被森林覆盖的土地,绝大部分森林是松树和云杉,巨大的森林一眼望不到边;即使今天,该国超过一半的国土仍为森林所覆盖。9 000 多年前,很有可能是充满诱惑的森林吸引了来自南部和东部的定居者。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文物和遗骨揭示了一种基本位于沿岸和主要水系广阔地带的渔猎文化。埃尔克是肉类、骨类、兽筋和兽皮的主要供应地,同样也以树木和石头吸引着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海豹提供了供消费和贸易的脂肪、肉和皮;鱼,特别是狗鱼、鸟、坚果和浆果为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提供了食物。

从大约公元前 3300 年起,相当于现在芬兰最西面的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该地制造具有篦纹特征的陶器。据认为,这种来自伏尔加地区的新文化的携带者同样操芬兰语,他们受所接触到的语言影响,逐渐形成了被历史语言学家命名的原始芬兰语。这些人看起来大多数定居在芬兰湾南部,不过看起来其中一个操萨米语的群体在较早时候从中分离出来,移民到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北部地区。同古波罗的海人和东日耳曼人的接触决定性地改变了原始芬兰语和操这种语言的人们。从芬兰湾南岸开始形成的四种主要芬兰语方言集团,即西南芬兰、海梅、萨瓦和卡累利阿,在随后几个世纪通过陆路和海路向北迁移。

到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北欧青铜时代开始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带出现了。在同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的交往中,西部和南部海岸的居民受到强烈影响,这些偏远地区继续从东部受到文化上的刺激。在河谷和沿岸平原更加富饶的土地上,农业开始成为文化常态;在北部和东部的森林和沼泽地区,渔猎文化继续兴盛。芬兰人的起源,特别是定居地和文化的“东方”和“西方”外观,仍然是很多争辩和偶尔冲突的主题,这种争辩已经影响到并继续塑造着芬兰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见解。芬兰人自己如何被外人理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这些早期作家(塔西佗在公元 1 世纪,乔达内斯在 6 世纪)提到的“芬尼人”试图辨认的北极地区居民,是北极地区的游牧猎人,他们可能确实同诸如 9 世纪的挪威渥太尔人这样的迁徙者进行贸易,后者对自己在北极旅行的叙述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王保存给后代。

这些在极北部定居的人被 12 世纪挪威历史描述为“令人遗憾地崇拜虚构的上帝的人,即卡累利阿人和奎尼人(Kweni),霍恩芬兰人(Hornfinns)和比阿米人(Biarmi)”。奎尼人和比阿米人也通过皮毛商人等其他途径为人所知,他们似乎是在白海与波的尼亚湾最北端之间的地区活动:作为与众不同的群落,他们曾经长期消失在时间的薄雾中。对于挪威人来说霍恩芬兰人可能是萨米芬兰人(SamiFinns,挪威最北端的地区称为芬马克[Finnmark])。卡累利阿人在 12 至 13 世纪开始从他们在拉多加和奥涅加的中心地区分散开来,向东到了北德维纳河的入口,向北到了北冰洋沿岸,在那里他们同挪威人发生冲突,而在西方则与海梅部落发生冲突。同时,他们同样开始受到东正教和诺夫戈罗德公国的影响和控制。

中世纪欧洲的“芬兰人”作为原始猎人、行巫术者和向搁浅的水手们兜售急需品的小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大西洋冒险者们的讲述。我们明显缺少关于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逐渐定居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有文字记载的证据,不过 13 世纪一则关于从丹麦到东波罗的海航路的描写显示,这是维京时代一条很好的海路,考古发掘同样显示西部芬兰人了解并应用了维京人的造船技术。

“芬兰”一词在中世纪已经通用,不过采用它的地区仍然不清楚和被错误界定。具有突出意义的是,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加强中央权威的手段:1229 年,教皇格里高里九世用这个词宣称芬兰已经处于他的保护下,瑞典国王芒努斯·拉杜洛斯(Magnus Ladulås)在 1284 年任命其弟本格特(Bengt)为芬兰公爵。在天主教和瑞典的权威加强之前,有些史料,如石刻铭文和正教修道院的编年史,使用芬兰一词通常更多指的是某些部落,如海梅。这些部落具备进行战争和贸易的组织能力,并且当重大事件需要的时候,他们有足够力量给自己的邻居制造麻烦;但这些从易北河一直延伸到北极圈的人与罗伯特·巴特利特曾经称呼的“没文化的多神崇拜者”圈中的人们有共同之处,最终都被纳入拉丁基督教徒的社团组织结构中。芬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 11 至 13 世纪能够生存下来,归因于他们在相当于现今瑞典中部平原的地区逐渐建立

了自己的领地。斯维王国和哥塔王国的扩张和兼并,向北和向西将诺尔兰、达拉那、哥得兰岛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瓦西奈斯-索米,艾根特里加)囊括进来。对于北欧乘船旅行的人们来说,在航行的季节里,波罗的海较浅的水不是障碍,而是提供了便利(不过冬季海上浮冰的确阻隔了通过海路和水路的联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所谓“十字军东征”之前环东北波罗的海边缘地带定居的人们已经混合与融合,而通常“十字军东征”是芬兰成为瑞典王国一部分的时期开始的标志。

5 18 世纪早期历史学家阿尔戈特·斯卡林(Algot Scarin)确信,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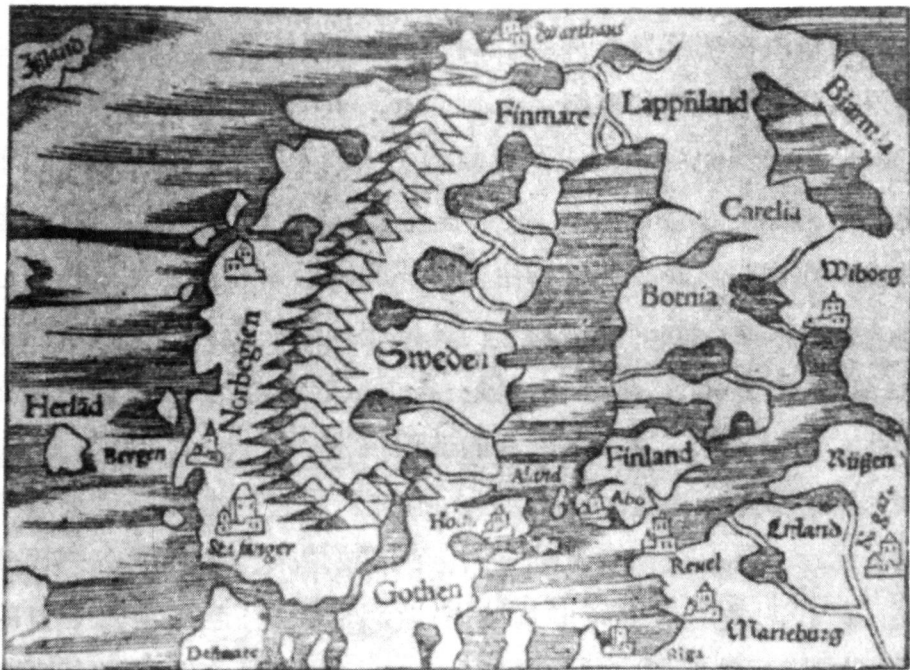


图 1 北欧地图,取自于塞巴斯蒂安·明斯特著作《1552 年的世界地图》。

第一幅详细的北欧地图是 1539 年在威尼斯印制的由奥劳斯·芒努斯(Olaus Magnus)编著的《卡塔·哥西卡》(*Carta Gothica*),后来重新命名为《卡塔·玛丽娜》(*Carta Marina*)。荒漠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和奥劳斯·芒努斯 16 年后出版的作品中对北欧人的描述一样。人类居住和耕作的遗存仅限于西南角的芬兰本土。北部和东部是野兽出没的森林,鱼和禽鸟的世界,偶尔有人驾驶小船穿过湖水,或乘坐由马或驯鹿拉的雪橇越过冰封的海面。《卡塔·玛丽娜》这一简本后来在 1544 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首次于巴塞尔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再版,此后又再版数次。明斯特以芬兰语作为说明文字,恰好表明对于这一遥远的地方普遍的忽视和混淆。用其英文译者乔治·诺斯的话来说:“芬兰地方居民操两种混杂的语言。从维堡到波尔沃,大部分有斯拉夫口音,但在近海岸地区他们操瑞典语,在该国中部地区他们讲本地语。”

6

基督教的纪念物或防御地点的缺少表明,芬兰的宗教仪式必定与其他北欧国家有所区别,而当芬兰人仍处于不开化状态时,瑞典人早已拥有了适合自己的最高权威。处在一个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看到瑞典对芬兰统治的建立——正如 M. G. 许贝里森 (M. G. Schybergson) 在其 1903 年所著《芬兰史》所描述的——以及西方基督教价值的灌输。最近学者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这个瑞典邦自身处在创建的初期阶段,而且大多数发生在芬兰这一边的事情同样发生在西方那一边。尽管一般而言十字军的强烈动机是把十字架及其福音传递给那些不信教者和异教徒,但并没有造成公共政治机构建立过程减缓的重大影响。100 年后的 13 世纪 70 年代初次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日期和性质的描述,有许多不确定之处。由英国人亨利控制的皈依工作据估计发生在短命的埃里克王朝(1155 或 1156 至 1160 年)期间。由于这两人不久都被谋杀并被抬高为广为传颂的圣徒,我们有理由对于民间传说的虚饰保持一分审慎。拉里(Lalli)关于亨利被谋杀的故事和随后发生的一些神奇事件,相对出现较晚。同时,埃里克的神圣品德被其子加以夸大,以炫示其家族的荣耀和声名。短暂的入侵可能对于瑞典王国同诺夫戈罗德公国之间冲突的增加不无影响,后者一直寻求在奥涅加和拉多加湖西部增加领土。侵掠和反侵掠并不是有计划的持续运动,而是常态,恩里克绝无实力和意愿帮助十字军使芬兰人皈依。

7

8

尽管有了某些布道活动,然而 1171 年格雷维斯(Gravis)教皇致乌普萨拉大主教和 1172 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其下属主教们的敕令要旨表明,这些活动进展有限。敕令想必是打算敦促瑞典采取行动,或者它是通过在丹麦王国的被驱逐的隆德大主教重新确定对新产生的瑞典主教区的权威。向东波罗的海扩展的贸易,促使德国商人前往哥得兰岛和诺夫戈罗德,巩固了丹麦在北欧的权利,并且推动了沿波罗的海南岸向东推行强制皈依进程的稳步进展,可能同样唤起了教皇对北欧新的兴趣。从 1191 年到 1202 年,丹麦军队数次入侵芬兰和爱沙尼亚。由里加主教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的阿尔伯特在 1200 年建立的“圣剑兄弟骑士团”忙于进一步向南扩展,迫使环绕道加瓦河口的利夫



图 2 亨利主教把谋杀他的拉里踩在脚下。

取自 1448 年出版的 *Missale Aboense*。根据从 13 世纪以来最早的传奇作品，亨利是英国人，被选为乌普萨拉的主教，他在 1150 年代同瑞典埃里克国王一起对芬兰进行十字军讨伐。他在一个冰冻的湖上被一个叫做拉里的农民谋杀了，后者受到其怀有怨恨的妻子的挑唆。13 世纪的一部诗作的残篇写道，亨利在死前颁布命令，他的遗体要由两头牛拉的车载运，牛歇息的地方就是他的安葬地。这一幕最后发生在努西埃宁，芬兰第一个主教席位，虽然这一席位最终在 13 世纪转到了图尔库，但努西埃宁在整个中世纪仍然是朝圣的中心。拉里由于自己的亵渎行为而遭到惩罚，当他打算脱下偷来的主教帽子时，却失去了自己的头皮。人们很想看到在这历史上头一遭有记载的芬兰人——“野蛮人”和“文明的”西方人之间宿命般的遭遇中，对于后来芬兰认同的发展一个范例。

人皈依。教皇的信件表明瑞典人同样进行了十字军东侵，不过直到丹麦军队最终把注意力转向芬兰湾南岸，并且在 1219 年征服了爱沙尼亚的林登尼斯要塞——被他们倾覆的城堡基础仍然是现代塔林市的轮廓线——在这之前他们看起来不打算在芬兰建立长期的政治存在。

到 13 世纪中期，在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相对富饶的平原上和分散的奥兰群岛上存在着一个可以辨识的基督教社会。主教教区最终在奥拉河岸建立起来，并且在后来 600 多年里成为芬兰国都的地方教区大教堂开始兴建，该地瑞典语称作“阿波”，或者“河边定居地”；芬兰语称做

图尔库,或“交易地”。在托马斯主教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异教的海梅人的布道开始了。这个皈依工作不唯天主教垄断,俄罗斯东正教也在海梅人中间积极活动,以向拉多加和奥涅加环湖地区扩展势力。事实上,由教皇格里高利四世在1237年发起的对海梅人的十字军行动,成为由教会和瑞典国王召集的军队同诺夫戈罗德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军队之间的剧烈冲突。俄罗斯编年史记载:1240年,瑞典军队在涅瓦河与伊兹哈拉河交汇处遭到沉重打击。但是,根据写于14世纪30年代的史诗《埃瑞克斯卡隆尼堪》(*Erikskrönikan*),瑞典人在九年后由强悍的贵族比格尔·亚尔(Birger Jarl)率领进行了报复,海梅人最终被征服。史诗说:“他们向基督徒献土乞和/我相信他们在那苟延残喘/那块土地转向我们的信仰/这使俄王痛苦不堪。”瑞典和挪威在1249—1250年陷于严重的冲突中,从日期上来说,使得这第二次的十字军行动事实上不大可能,而且有人认为它确实在早此十年前发生,在巨大的灾难,即诺夫哥罗德处于蒙古人的高压之下,袭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前。

不管事实真相怎样,图尔库和海梅坚固的堡垒建筑是瑞典皇家权威存在于波的尼亚湾东岸的可见证据。在东部边界的维堡,城堡基础的三分之一到13世纪末被倾覆,瑞典同诺夫哥罗德旷日持久的战争在1323年以签订和平条约正式结束。《奥列沙克和约》(*Oreshek, Pähkinäsaari, Näteborg*)的确切条款在历史学家当中引起了很多争论。看起来双方确定了对卡累利阿—伊萨摩边界线进行公平细致地描绘,使该处一分为二,但是此后对于该分界线的解释确是开放的。可能出于收税的目的,双方对居住在延伸于从大湖区到北极广大森林和沼泽地区的居民进行界定的兴趣要大于保障边界安全的兴趣。随后,由于内部动荡,蒙古人、立陶宛人和条顿骑士团的威胁,诺夫哥罗德大大削弱,而无力保障这些权力了。但是16世纪第一批在北极沿岸定居的俄国人追溯既往,恢复了对这一地区主权的宣示和征税权。

在芒努斯·拉杜洛斯王朝(1275—1290)和芒努斯·艾里克松(Magnus Eriksson)王朝期间,瑞典贵族议会的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组织的出现,以及法典的确立,成为王国巩固的最明显标志,而王